

宁滁安三地文化交流研讨会发言摘登之二

浅谈“宁滁安”三地之间文化连接之纽带

◎朱元璋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夏玉润

这次会议的主题是“宁滁安三地明文化探寻”。而连接三地文化之纽带，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一历史人物。

一、渡江战役前，朱元璋队伍由两部分组成

朱元璋曾说过：“予自兵兴，十有余年，所将之兵从渡江者，皆濠、泗、安丰、汴梁、两淮之人，用以功取四方，勤劳甚矣。以其为亲兵也，故遣守外郡以佚之。”除他所说的汴梁外，其余的地方均属于明代凤阳府。主要是凤阳府的人帮助他取得了天下。

渡江战役前，朱元璋队伍由两部分组成。第一部分是郭子兴队伍（郭家军）；定远、凤阳人。第二部分是朱元璋自己的队伍（朱家军）。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，朱元璋入滁州城，投奔郭子兴，并成了郭子兴的女婿。朱元璋于元至正十四年正月南略定远，离开滁州时仅带了24人，这是朱元璋的最初队伍，均是凤阳、定远人。攻下定远后，朱家军已有近3万人。至正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，朱元璋攻下滁州。接着，郭子兴的队伍也来到了滁州。两军并成一军，近5万人。

在朱元璋驻守滁、和期间，凤阳府其他州县以及巢湖水军纷纷投入朱元璋，其中就包括常遇春等人。

郭子兴死后不久，朱元璋于至正十五年六月初二领军渡江。渡江战役成为朱元璋队伍的分界线，90%以上明初开国功臣（公侯）均是渡江战役前投奔朱元璋的。渡江后，在攻打集庆过程中，郭子兴的两个儿子阵亡。从此，郭家军的队伍并入了朱家军。

在上述凤阳府地区中，凤阳、定远两县的民众是朱元璋队伍中的核心力量。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全国各地卫所大多都有凤阳、定远籍的军官，且官高位显。

二、南京城内的公侯，主要是渡江前的将领

建立明朝后，最初跟随朱元璋创立天下的凤阳府开国功臣们都成了京都鼎臣、封疆大吏。其中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，被封为公侯者，大多数是凤阳府人。28侯中，有14人是凤阳、定远人，且全部排名在前。

洪武四年统计，南京城中“公侯族属”达1197户，计其人口达万人左右。如果再加其他军官、军士，估

计十倍以上。故明初贝琼诗曰：“两河兵合尽红巾，岂有桃源可避秦？马上短衣多楚客，城中高髻半淮人。”凤阳府籍的军士，成了南京城的主人。把上述凤阳府籍公侯、军士们说成是南京人，也未尝不可。

三、南京城的主人——朱元璋部队占据贵州

贵州一带的民众，主要以少数民族为主。早在洪武五年，在明军的军威下，贵州土官开始归顺。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九月，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，蓝玉、沐英为左右将军，率师征滇。仅一二年，西南一带全境平定。十六年三月，朱元璋召回征滇军队，留沐英镇守。沐英（1344—1392），凤阳府定远县人，朱元璋的养子。在云贵一带军队中，凤阳人占较大的比例。

洪武十五年，朱元璋设立“贵州都司”，下辖18卫和2个一级守御千户所，是明朝设立于地方的军事指挥机关，掌一方军政。由于贵州的地理位置、民众构成十分特殊，所以这里的都司不仅管辖当地军卫，还直接管辖部分州县。再加上军卫移民的人口多于当地民籍人口，所以军籍移民文化逐渐成为这里的主体文化。

安顺屯堡有“三十军屯、四十九堡”之称，明代安庄、普定、平坝三卫并列，往东还有威清卫，往西关岭守御千户所，大量屯军分布在交通主干线上，形成了较为密集的屯堡区域，其军户、民户之多在明代贵州各卫中居于前列。

明初进驻贵州的卫所武官，绝大多数袭职于明末。明亡后，卫所武官大多依附了清朝，有的还转为武职。后裔大致有两大去向：一是世代聚居在卫所驻地，坚守着汉人的身份与文化传统，形成了点状分布的“屯堡”村落。二是随着军户人口的增长，逐渐与少数民族共居。其中居住在“屯堡”村落的军卫后裔，称“屯堡人”，并成为今天的贵州省平坝、安顺、镇宁、普定、长顺等县市内明初屯军后裔的专称。

在上述地区的部分屯堡中，“屯堡人”的语音、服饰、民居建筑以及娱乐方式依然沿着明代的文化习俗。其主流服饰“凤阳汉装”，是一种源于明代南直隶凤阳府的汉族妇女服饰，具体表现在：发型为高束前发，形若鸡冠，梳三绺头，称“凤头髻”；穿青布上衣，袖口较大，前襟刺绣花边；佩戴大耳环；不缠足，脚穿绣花翘尖鞋。对此，当地学者对“屯堡人”“凤头髻”作如

下解释：屯堡人还有“屯军堡子”“屯田子”“堡子”等别称或简称。又因其妇女为天足不裹脚，故又被称为“大脚”“凤头髻”“凤头鸡”。凤头鸡当是与“凤阳头髻”“凤头髻”之音近意识所致。外地人不知其详，见其妇女衣着头饰与其他汉民不同，以为是贵州的少数民族，于是更有“凤头苗”之误称也。

屯堡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。移民大多是军籍移民，因首领及人数较多的军士，均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——凤阳府籍人，他们必然把原籍的文化带至安顺一带。由于凤阳府定远人、朱元璋义子沐英及其家族一直是云贵地区的主帅，有明一代凤阳府籍军士们在这里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，所以在文化传承方面也占据着主动权。他们与当地文化相互影响、相互融合，从而形成一种带有移民色彩的特殊民俗，一直沿袭至今。



穿着明代江淮服饰的屯堡女人

宁滁安三地历史文脉共融之特点

◎滁州市政协原常委、文史委主任 张祥林

在中国的明史版图上，南北通衢的“京京驿道”（南京—北京）将京师（后称南都）与畿辅重地滁州、帝乡凤阳这一段连成了热线。无论从地理因素、历史渊源、方言习俗还是自身认同来说，滁州凤阳与南京都可谓明文化的发祥地、核心区。而出于“滇黔要区”的贵州安顺与此相隔千山万水，也因屯堡人文的历史渊源而与南京、凤阳、滁州根脉相连。在这三地的历史文脉探寻中，他们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呢？

一、以南都为中心，帝乡畿辅为自豪的明皇正统文化

三地的明文化主线，以宣扬明太祖丰功伟绩贯穿其中。彰显大明汉文之统绪，弘扬太祖龙凤征伐神威，肇基开疆精神。从明初的建筑遗存看，凤阳中都、南京城墙，无不处处显示出大明王朝开基的恢弘气派。凤阳明皇城钟鼓楼上的题额“万世根本”“四方之极”正是太祖功垂天下、明统汉统江山写照。三地遗存的文献、碑刻中，有大量关于明太祖建功立业的记述。

明太祖登基后，曾两次临幸被称为“开天首都”的滁州，太祖敕建的“柏子潭神龙效灵碑”以及龙潭周边的恢弘建筑，成为具有皇家色彩的地标。四方宾客来滁，莫不至此顶礼膜拜。两京古驿道滁州清流关刻着四个大字“金陵锁钥”，凸显滁州对南京的拱卫作用。我们从朱元璋的《感旧记》中，读出了他对滁州的深厚感情。洪武六年（1373），朱元璋下诏在滁州设立管理全国民政的中央机构太仆寺，永乐十九年改称南京太仆寺，寺署在滁二百七十年，直到明朝终结。

与滁州南京遥距千里的安顺，屯堡人的先祖认同是对明皇正统文化的尊崇，“先祖来自明朝南京凤

阳”的群体认知，其实质是对汉文化一统的追求和坚守。“龙腾马跃”是明初王朝的蓬勃气象。南京有龙江、滁州有龙潭，安顺有龙官龙井。滁州军民养马，安顺军民屯田，同为巩固大明江山。屯堡地戏表演的内容都是征讨叛逆、金戈铁马捍卫汉统江山的故事演绎，儒家文化的忠君报国作为精神支柱。我们从中也许能感受到，屯堡人为什么能够六百年坚守大明统绪的内在动力。

二、群体移民、迁客流寓，形成南北融合的地域风景

江淮之间南北交汇的地理位置，向为历代移民迁徙的通道，也是明文化的走廊。从某种角度说，宁滁安三地都是历史形成的移民城市。

江北文化名山琅琊山，在南北融合的历史上成了一座地标。“琅琊”作为古老的地名，在山东胶南临沂一带由山名、县名、郡名、国名而演变。永嘉元年（307），世袭琅琊王的司马睿率中原汉族臣民“衣冠南渡”，与王导等人一度驻扎江北涂中（今滁州）西南的摩陀岭山中，谋划南立之策。唐代滁州刺史独孤及在《琅琊溪述》一文中说：“按《图经》，晋元帝之居琅琊邸而为镇东也，尝游息是山，厥迹犹存，故长夫（李幼卿）名溪曰琅琊。”宋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琅琊山在（清流）县西南十二里，其山始因东晋元帝为琅琊王避地此山，因名之。”东晋太兴三年（320），晋元帝在江乘县侨置琅琊郡，前后存在了250余年，其大致范围包括今天的南京下关和栖霞全境，以及句容的一部分。

移民的结果改写了区域经济文化和社群的历史，催化了南北融合。明初朱元璋组织大规模移民，十数万江南移民解至帝乡凤阳，称为“编民”，凤阳花鼓就是移民的产物。安顺屯堡则向世人展现了一道独特的延续时空的明代移民文化风景。

移民之外，江淮两岸也是历代流寓文化区域，明代南京尤为迁客使臣、商旅行者的集散地。滁州“南北冠盖之所经”，游宦、商贾、驿使、差夫纷至沓来，拓展了京都与地方的信息链接、开阔了官僚缙绅之间人文交际的空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近代抗战和新中国建立前后，一批滁人随军转战或迁徙云贵，成为定居于黔的新移民。

三、崇文重教，重视科第与教化并行的儒学风气

三地在宋明理学正统文脉引导下，明清两朝都

建有官学、书院和义学。江南贡院兴盛于明清两代五百多年。全椒南谯书院、滁州阳明书院、南京新泉书院，明中后期声名远播；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安顺文庙被称为“黔中儒学圣殿”。创设于清康熙三十年的安顺双明书院，是黔中书院的代表。在宋明理学的传播中，值得重视的是王阳明先生曾过化三地，播下心学种子。阳明先生在贵州龙场悟道，是阳明学生成的第一阶段，正德八年到九年，王阳明任南京太仆寺少卿，在滁州琅琊山下讲学，这是阳明学发展的第二阶段。王门游学从滁州发端，走向大江南北。

明清两朝，三地都不乏乡贤宦宦教化善政。太平军战后，曾国藩等中兴名臣在南京复兴文教。胡林翼曾任安顺知州。晚清名士薛时雨在杭州和金陵主办书院，在江南士子中培育了一大批经国济世人才。近现代滁人在南京和贵州的人文建树，吕彦直设计中山陵、胡克铭设计南京长江大桥、方志均补写灵谷寺建国大纲。张汝舟先生在贵州治学数十年，堪为天文历法的一代宗师，张振佩、张新民父子执教贵大是为当代著名史学家。

四、崇尚山水林泉，寓景寄情的诗性表现

宁滁安三地山水嘉盛，得天独厚自然美景使得文化有了优雅的寄托。明中期以后，“杏花春雨江南”的柔情逐渐浸润到江淮之间。以瀑布溶洞为主题的安顺山水奇观，以及屯堡人家的山寨石屋更标志着独特的诗与远方。从留都而出的士大夫们带着江南的风华，更多了一些人性和自然的追求。他们往游于中都、滁州、南京之间以及大西南，留下很多文化遗迹、纪文刻石、咏物寄情，或评论时事，感慨人生，表达他们对先贤的敬仰、对天然山水的钟爱、对社会的人文关怀。近代流寓贵州的凤阳籍画家刘知白（1915—2003），以黔城山川为题材，潜心创造了中国泼墨大写意山水画新技法，成为中国画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泼墨大家。

结语：宁滁安三地的历史文脉相因相承，同中有异，构成了明文化走廊中丰富多彩的篇章。三地的人文遗产中，尚有诸多有价值的史迹、文物、文献有待于发掘整理保护和利用。探究研究这些宝贵遗产，促进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弘扬三地区域文化的经典之作，在新时代实现古今文脉与城市灵魂的沟通，促进三地经济文化社群更广泛更深入的融合！



从『淮右』到『江左』——由『徽京』一词看滁宁两地的文化认同

◎滁州电视台专题栏目制片人 郑心一

六百多年前，即洪武七年，朱元璋在他的《阅江楼记》一文中写到大明的江山是“起于淮右，立业江左”。这里的“淮右”是指滁州，包括凤阳县、定远县、明光市等地在内的广大区域，而“江左”则是指南京。这是滁州、南京两地紧密关系的首度皇家发布。

今天，南京是滁州人出行的第一选择。看病、购物、旅游休闲，首选地是南京，甚至南京还成为了滁州人置业创业外向发展的首选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南京有30万滁州人，几乎占南京人口的4%。滁州大街上的车牌，除了“皖M”，最多的是“苏A”。以致于在安徽、江苏两地的民间，南京有着“徽京”之说，看似戏谑，却透露出两地人心理上的文化认同。

南京号称“六朝古都”，其中的三朝建国与滁州密不可分：东晋的司马睿在渡江南下前，正是在滁州的琅琊山韬光养晦，谋划图远，才有琅琊山的得名，才有了后来的“五马渡江，一马成龙”的东晋开国；南唐第一代国主李昇，幼年时流落在凤阳临淮一带，为寺僧僧童，后被杨行密收留，入身行伍，终成南唐大业；与李昇有着惊人相似经历的是洪武帝朱元璋，也是由凤阳寺庙小僧而成大明国君。

在南京的城建史上，有三次高峰期，一次是三国的孙权建立建邺城，奠定六朝南京的格局；一次是南唐李昇改造六朝、隋唐的城址，承前启后，今天南京城南段还保留原来的风貌；第三次是明代朱元璋扩大南京城的建制，南京城第一次成为大一统政权的皇城。

朱元璋起兵凤阳，以滁州为根据地，进据金陵；又以金陵为依托，谋取天下。大明建国后，许多淮右功臣勋爵进入南京，同时代的诗人贝琼说“马上短衣多楚客，城中高髻半淮人”。据《明太祖实录》记载：洪武四年，南京城内王公贵族多达1197户，估计人口达万人左右。其中淮右将臣占绝大多数。这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淮右人的深度融入，并且从帝王到宰辅到文武武将，对南京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生活习惯等进行全面地再塑造和再定位。甚至，“南京”的得名也源自朱元璋，并且将管理马政的南太仆寺衙署也设立在滁州，将中央机构设立在首都之外，这是罕见的。

现在从南京经江浦到滁州，再到凤阳的古驿道仍然眉目清晰，铺道和建筑遗存比比皆是，有市级文保单位赤湖铺桥，省级文保单位清流关、国家级文保单位池河太平桥等，这在整个华东地区极为罕见。在沿途殊龙驿设立的广武卫、池河驿设立的飞雄卫、红心驿设立的英武卫，无不凸显出这一条皇家规格的驿道的特殊地位。

今天，“中国明清城墙”作为一个整体，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，包括南京、西安、荆州、襄阳、临海、寿县和凤阳。其中只有南京和凤阳的城墙属于皇城城墙，规格最高，其他的则属于二级王城或者州府级规格。



考察城墙博物馆

南齐诗人谢朓说南京是“江南佳丽地，金陵帝王州”，江南佳丽地很多，南京能以帝王州独出其表，滁州给予了很大的支撑。

朱元璋也是南京实现跨江发展的第一人，他首次把江北的“江浦”建设为“卫星城”，实现跨江发展。洪武九年（1376），“江浦”县由滁州、和州、六合析地而成，所以历史上，江浦就与滁州有着连筋带肉的关系。在明代，一直把江浦、和州、滁州作为南京的卫星城市来发展。

在今天的滁城，还有和南京一模一样的地名，比如四牌楼、文德桥、鲜鱼巷、南台巷、上水关、下水关。南京有乌衣巷，滁州有乌衣镇。如此众多完全相同的地名，绝不仅仅是巧合，而是宁滁两地深度融合的证明。

不论是明代的“南直隶”，还是清代的“江南省”，江苏、安徽一直同属一省。清代后来实行两省分治，江宁府作为安徽的省府仍然长达100多年，可谓是一家好分、情难舍。清代江南贡院每三年一度的会考，数万名来自江苏、安徽的考生会在一起，考在一处，这些文化的种子，更是在心理上很难分家。

2000年，南京首次提出“南京都市圈”的概念，滁州作为8个核心区域城市之一，在南京市的发展规划上，滁州的凤阳县和江苏的淮安市一起，成为南京北向纵深发展的两大支点。今天的南京经济正由“秦淮河时代”，向“扬子江时代”转变；滁州的经济，也由早先的“清流河时代”，向“长三角时代”升级。扬子江成为了滁宁两地经济发展的同源同脉。深度融合，借力南京，抓住机遇，借势而上，已经成为滁州人的共识。

在南京的周边，没有哪一座城市在政治上、军事上、经济上、文化上与南京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。滁州向南，南京向北，滁宁两地正在以高速公路、高速铁路、城际轻轨的速度实现双向奔赴。“徽京”一说，既有历史的渊源，又有现实的写照，看似戏说，实则讲真。



考察明光跃龙南